



梁启超 说佛

梁启超 著

近代中国之思想启蒙者
对传统佛学之独到见解
引领人们深入了解佛文化之精髓

佛学广矣 大矣 深矣 微矣
切于人事 证于实用

译林出版社

梁启超 说佛



梁启超 著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梁启超说佛 / 梁启超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
2016.1

ISBN 978-7-5447-5981-6

I. ①梁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佛教—研究
IV. B9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78158 号

书 名 梁启超说佛

作 者 梁启超

责任编辑 陆元昶

特约编辑 苏雪莹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译林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
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14

字 数 240千字

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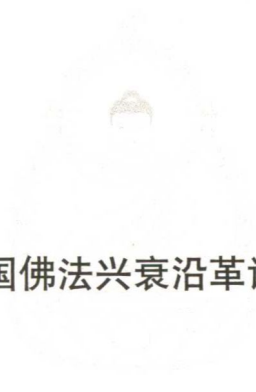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5981-6

定 价 36.8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	1
佛教大事表	24
佛教之初输入	28
汉明求法说辨伪	32
《四十二章经》辨伪	39
《牟子理惑论》辨伪	48
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	51
说无我	87
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	95
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	135
佛教心理学浅测	155
支那内学院精校本《玄奘传》书后	185



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

佛法初入中国，相传起于东汉明帝时。正史中记载较详者，为《魏书·释老志》，其文如下：

“汉武……开西域，遣张骞使大夏还，传其旁有身毒国，一名天竺，始闻有浮屠之教。哀帝元寿元年，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。中土闻之，未之信了也。后孝明帝夜梦金人，顶有白光，飞行殿庭，乃访群臣，傅毅始以佛对。帝遣郎中愔、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，写浮屠遗范。愔仍与沙门摄摩腾、竺法兰东还洛阳。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，自此始也。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，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，经缄于兰台石室。愔之还也，以白马负经而至，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。摩腾、法兰咸卒于此寺。”

此说所出，最古者为汉牟融《理惑论》。文在梁僧祐《弘明集》

中，真伪未敢断。（《隋书·经籍志》有《牟子》二卷。注云：汉太尉牟融撰，今佚。《弘明集》本篇篇目下注云：一名苍梧太守牟子博传。然读其内容，则融乃苍梧一处士，流寓交趾，不惟未尝为太尉，且未尝为太守也。书凡三十七节，专务拥护佛法，文体不甚类汉人，故未敢置信。若其不伪，则此为论佛法最古之书矣。）其后文饰附会，乃有永平十四年僧道角力、宗室妃嫔数千人同时出家种种诞说。又造为摩腾所译《四十二章经》，编入藏中，流通迄令。殆皆不可信（此等诞说最古者，出《汉显宗开佛化法本内传》，见唐道宣《广弘明集》，注云：未详作者。据所说则道士褚善信、费叔才奉敕集白马寺前与摩腾等斗法，道经尽毁云云）。大抵愴、景西使，腾、兰东来，白马驮经，雍西建寺，事皆非虚。然所谓提倡佛法者亦仅此。至于创译经典，广度沙门，则断非彼时所能有事也（《四十二章经》真伪别详第五章）。然诵习佛法者早已有人，盖不容疑。《后汉书·光武十王传》云：

“楚王英喜为浮屠斋戒，永平八年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赎愆罪。诏报曰：‘王诵黄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慈。洁斋三月，与神为誓，何嫌何疑，当有悔吝。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饌。’因以班示诸国。”

汉明遣使事，相传在永平十年（《释老志》《弘明集》《高僧传》皆无年岁。其指为永平十年，自隋费长房之《历代三宝记》始）。然报楚王英诏在永平八年。浮屠（佛陀）、伊蒲塞（优婆塞）、桑门（沙门）诸名词，已形诸公牍，则其名称久为社会所已有可知。有名称必先有事实，然则佛法输入，盖在永平前矣。《释老志》称：



尼泊尔蓝毗尼园的大菩提树浴佛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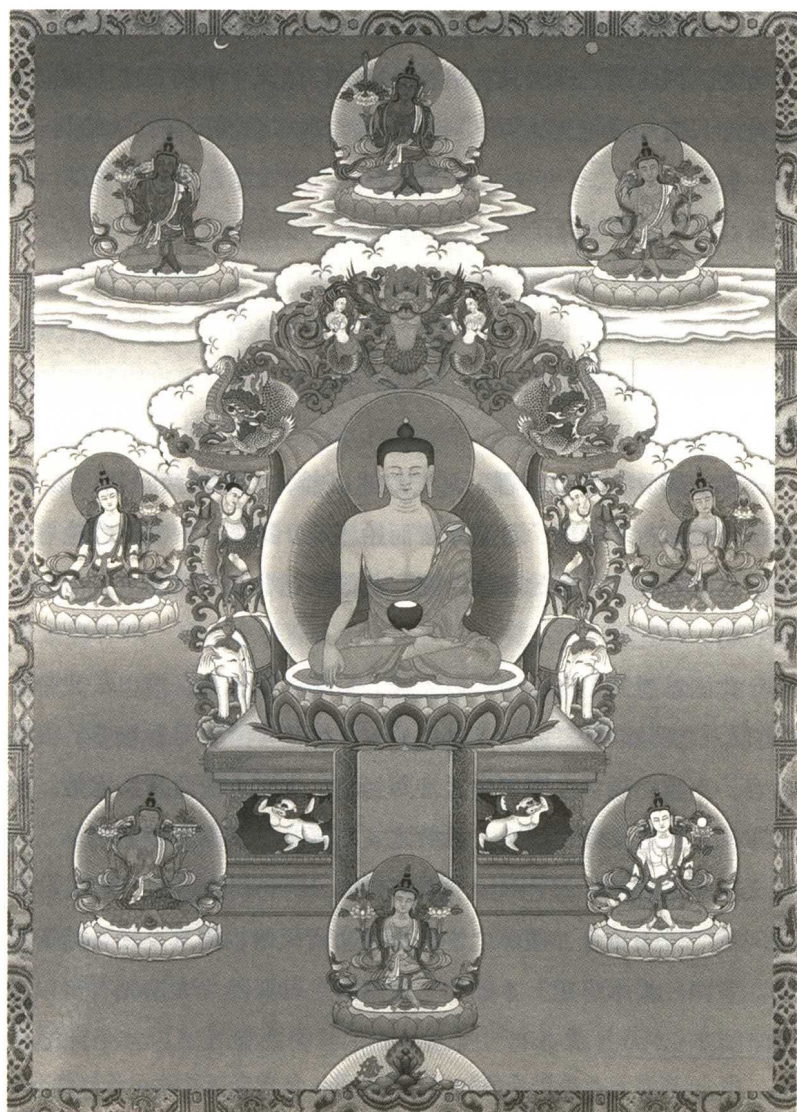
释迦牟尼佛诞生地——尼泊尔蓝毗尼园。遗址中央是摩耶夫人祠，祠内有摩耶夫人诞子浮雕，可惜浮雕已残破。据说净饭王的夫人摩耶产期将至，按当地习俗回母家分娩，在途经蓝毗尼园时，在花园中见一棵大树，花色香鲜，枝叶茂盛，就举起右手想摘一枝，这时从右肋生下了释迦牟尼。

“汉世沙门，皆衣赤布。”则当时沙门，应已不少。然据晋石虎时著作郎王度所奏，谓：“汉明感梦，初传其道。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，其汉人皆不得出家。魏承汉制，亦循前轨。”（《高僧传》卷十《佛图澄传》引）此述汉魏制度，最为明确。盖我国自古以来，绝对的听任“信教自由”，其待远人，皆顺其教不易其俗。汉时之有佛寺，正如唐时之有景教寺，不过听流寓外人自崇其教，非含有奖励之意也。然桓帝延熹九年，襄楷上书，有“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”一语（《后汉书》本传）。据此，则其信仰已输入宫廷矣。桓、灵间，安息国僧安世高，月支国僧支娄迦谶，先后至洛阳，译佛经数十部。佛教之兴，当以此为纪元。

三国时刘蜀佛教无闻，曹魏稍翻有经典。而颍川朱士行以甘露二年出家，实为汉地沙门之始（据费长房《历代三宝记》卷三）。士行亦即中国西行求法之第一人。吴孙权因感康僧会之灵异（参观《高僧传·会传》），在建业建初寺，是为佛教输入江南之始。而支谦亦在吴译《维摩》《泥洹》《法句》诸经，故后此佛学特盛于江南，谦之功也。

至西晋时，洛下既有寺四十二所（见《释老志》），而竺法护远游西域，赍经以归，大兴译事，河北佛教渐以光大。及石勒僭号，而佛图澄常现神通力以裁抑其凶暴（参观《高僧传·澄传》），其于佛教之弘布，极有力焉。

计自西历纪元一世纪之初至四世纪之初约三百年间，佛教渐渐输入中国且分布于各地。然其在上社会上势力极微薄，士大夫殆不知有此事。王充著《论衡》，对于当时学术、信仰、风俗，皆痛下批评，然无一语及佛教，则其不为社会注目可知。沙门以外，治此学者，仅一牟融。然所著书犹真伪难断，具如前说。



释迦牟尼佛和八大菩萨

此期之佛教，其借助于咒法神通之力者不少。摩腾角力，虽属诞词，然康会在吴，佛澄在赵，皆藉此为弘教之一手段，无庸为讳。质言之，则此期之佛法只有宗教的意味，绝无学术的意味。即以宗教论亦只有小乘绝无大乘。神通小术，本非佛法所尚，为喻俗计，偶一假涂^①。然二千年来之愚夫愚妇，大率缘此起信。其于佛法之兴替，功罪正参半耳。

二

佛法确立，实自东晋。吾于叙述以前，先提出两问题：第一，佛法何故能行于中国，且至东晋而始盛耶？第二，中国何故独尊大乘，且能创立“中国的佛教”耶？此第二题，当别解答之，今先答第一题。

我国思想界，在战国本极光明。自秦始皇焚书，继以汉武帝之“表章六艺罢黜百家”，于是其机始窒。两汉学术，号称极盛，揽其内容，不越二途：一则儒生之注释经传，二则方士之凿谈术数。及其末流，二者又往往糅合。术数之支离诞妄，笃学者固所鄙弃，即碎义逃难之经学，又岂能久饜人心者？凡属文化发展之国民，“其学问欲”曾无止息，破碎之学既为社会所厌倦，则其反动必趋于高玄。我国民根本思想，本酷信宇宙间有一种必然之大法则，可以范

^① 《高僧传·佛图澄传》：“石勒问澄，佛道有何灵验？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，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咒之，须臾生青莲花。……”《续高僧传·菩提流支传》：“支咒水上涌，旁僧嘉叹大圣。人。支曰：‘勿妄褒赏，斯乃术法。外国共行，此方不习，谓为圣耳。’”

围天地而不过，曲成万物而不遗。孔子之《易》，老子之五千言，无非欲发明此法则而已。魏晋间学者，亦欲向此方面以事追求，故所谓“易老”之学，入此时代而忽大昌。王弼、何晏辈，其最著也。正在缥缈彷徨，若无归宿之时，而此智德巍巍之佛法，忽于此时输入，则群趋之，若水归壑，固其所也。

季汉之乱，民瘼已甚，喘息未定，继以五胡，百年之中，九宇鼎沸。有史以来，人类惨遇，未有过于彼时者也。一般小民，汲汲顾影，旦不保夕，呼天呼父母，一无足怙恃。闻有佛如来能救苦难，谁不愿托以自庇？其稔恶之帝王将相，处此翻云覆雨之局，亦未尝不自忧祸害。佛徒悚以果报，自易动听，故信从亦渐众。帝王既信，则对于同信者必加保护。在乱世而得保护，安得不趋之若鹜？此一般愚民奉之之原因也。其在“有识阶级”之士大夫，闻“万行无常，诸法无我”之教，还证以己身所处之环境，感受深刻，而愈觉亲切有味。其大根器者，则发悲悯心，誓弘法以图拯拔；其小根器者，则有托而逃焉，欲觅他界之慰安，以偿此世之苦痛。夫佛教本非厌世教也，然信仰佛教者，什九皆以厌世为动机，此实无庸为讳，故世愈乱而逃入之者愈众。此士大夫奉佛之原因也。

前所论者为思想之伏流，此所论者为时代之背景。在此等时代背景之上，而乘之以彼种之思想伏流，又值佛法输入经数百年，酝酿渐臻成熟，此所以一二大德起而振之，其兴也，沛乎莫之能御也。

中国佛教史，当以道安以前为一时期，道安以后为一时期。前此稍有事业可纪者皆西僧耳（即竺法护，亦本籍月氏）。本国僧徒为弘教之中坚活动实自安始。前此佛学为沙门专业，自安以后，乃公之于士大夫，成为时代思潮。习凿齿与谢安书云：“来此见释道安，故是远胜，非常道士。师徒数百，斋讲不倦。无变化技术，可



印度佛陀伽耶中国寺院

以惑常人之耳目；无重威大势，可以整群小之参差。而师徒肃肃，自相尊敬，洋洋济济，乃是吾由来所未见。其人理怀简衷，多所博涉；内外群书，略皆遍睹；阴阳算数，亦皆能通。佛经妙义，故所游刃。”（《高僧传·安传》）此叙安威德，盖能略道一二。安值丧乱，常率弟子四五百人转徙四方，不挠不乱。安十五年间，每岁再讲《放光般若》，未尝废阙。安不通梵文，而遍注诸经，妙达深指，旧译讹谬，以意条举，后来新译，竟与合符。安创著《经录》，整理佛教文献。安制僧尼轨范，佛法宪章，后来寺舍，咸所遵守。安劝苻坚迎罗什，间接为大乘开基。安集诸梵僧译《阿含》《阿毗昙》，直接为小乘结束。安分遣弟子布教四方，所至风靡，若慧远之在东南，其尤著也。安与一时贤士大夫接纳，应机指导，咸使妙悟，大法始盛行于居士中（以上杂据《高僧传·安传》及其他诸传，不备引原文）。要而论之，安自制力极强，理解力极强，组织力极强，

发动力极强，故当时受其人格的感化与愿力的加被，而佛教遂以骤盛。安，常山人，所尝游栖之地极多，而襄阳与长安最久。卒于东晋安帝之太元十年（公元385年）。自安以后，名僧接踵，或事翻译，或开宗派，其应详述者极多，本章惟随举其名耳。惟安公为大法枢键，故稍详述如右。

三

东晋后佛法大昌，其受帝王及士大夫弘法之赐者不少。其在北朝，则苻坚敬礼道安。其秘书郎赵正尤崇三宝，集诸僧广译经论。



永泰寺

永泰寺是佛教禅宗传入中国后修建的第一座尼僧寺院，也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一家皇家尼僧佛寺，被称为佛教禅宗尼僧祖庭，与“天下第一名刹”少林寺有姊妹院之称。

姚兴时，鸠摩罗什入关，大承礼待，在逍遥园设立译场，集三千僧咨禀什旨。大乘经典，于是略备。故言译事者必推苻姚二秦。北凉沮渠蒙逊供养昙无讖及浮陀跋摩，译经甚多。其从弟安阳侯京声，亦有译述。西秦乞伏氏，亦尊事沙门，圣坚司译焉。北魏太武帝一度毁佛法，及文成帝兴复之，其后转盛。献文、孝文，并皆崇奉。宣武好之尤笃，常于宫中讲经。孝明时，胡太后秉政，迷信尤甚，几于遍国皆寺，尽人而僧矣。魏分东、西，移为周、齐。高齐大奖佛法，宇文周则毁之。隋既篡周，文帝首复佛教，而炀帝师事智顗，崇奉尤笃。在东、西两京置翻经院，译事大昌焉。

其在南朝、东晋诸帝，虽未闻有特别信仰，而前后执政及诸名士，若王导、周顗、桓玄、王濛、谢尚、郗超、王坦之、王恭、王谧、谢敷、戴逵、孙绰辈，咸相尊奉（见《弘明集》卷五引何尚之《答宋文帝问》）。及宋，则文帝虚心延访，下诏奖励。譙王义宣所至提倡，而何尚之、谢灵运等阐扬尤力。及齐，则竟陵王子良最嗜佛理。梁武帝、沈约辈皆尝在其幕府，相与鼓吹。及梁，武帝在位四十年中，江左称为全盛。帝嗜奉至笃，常集群臣讲论，至自舍身于同泰寺。昭明太子及元帝皆承其绪，迭相宏奖。佛教于是极盛。陈祚短促，无甚可纪。东晋、南北朝及隋帝王执政提倡佛教之情形，大略如此。

唐宋以后，儒者始与佛徒哄，前此无之也。两晋、南北朝之儒者，对于佛教，或兼采其名理以自怡悦，或漠然置之，若不知世间有此种学说者然。其在当时，深妒佛教而专与之为难者，则道士也。梁僧祐《弘明集》、唐道宣《广弘明集》中所载诸文，其与道家抗辩者殆居三之一。其中如刘宋时道士顾宪著《夷夏论》，谢镇之、朱昭之、慧通、僧愍等驳之；南萧齐时张融著《门论》，周顗驳之；道士

复假融名著《三破论》，刘勰著《辩惑论》驳之，其最著者也。所谓道教者，并非老庄之“道家言”，乃张道陵余孽之邪说。其于教义本一无所有，及睹佛经，乃剽窃其一二，而肤浅矛盾，无一处。乃反伪造《老子化胡经》等，谓佛道实出于彼，可谓诞妄已极！其壁垒本不足以自立，乃利用国民排外之心理，倡所谓夷夏论者，此较足以动人。谢、朱辈本非佛徒，亦起而驳之，于学术无国界之义，略有所发挥焉，盖非得已也。然在南朝则以言论相排挤而已，北朝则以势力相劫制。北魏太武帝时，信任崔浩。而浩素敬事“五斗米道教”之寇谦之，荐之魏主拜为天师，改年号曰“太平真君”。太平真君七年（公元446年），忽诏诛长安沙门，焚破佛像，令四方一依长安行事。其诏书所标榜者，曰：“荡除胡神，击破胡经。”其法则：“沙门无少长悉坑之，王公以下敢隐匿沙门者诛一门。”（《魏书·释老志》）我国有史以来，皆主信仰自由，其以宗教兴大狱者，只此一役。元魏起自东胡，犷悍之性未驯也。后四年，浩亦族诛，备五刑焉。魏毁佛法凡七年，文成帝立，复之，后转益昌。后七十余年，孝明帝正光元年（公元520年），又再集佛道徒使讨论。道士姜斌以诬罔当伏诛，而佛徒菩提支为之乞杀。又五十余年，周武帝建德元年（公元572年），下诏并废佛道两教，寻复道教。越十年（大象元年），并复之。然此役仅有遣散，并无诛戮云。计自佛法入中国后，受政府干涉禁止者，仅此两次。时皆极短，故无损其流通。其间，沙汰僧尼，历代多有。然于大教，固保护不替也。

佛教发达，南北并进，而其性质有大不同者：南方尚理解，北方重迷信；南方为社会思潮，北方为帝王势力。故其结果也，南方自由研究，北方专制盲从；南方深造，北方普及（此论不过比较的，并非谓绝对如此。勿误会）。此不徒在佛教为然也，即在道教已然。



甘肃天水麦积山 44 号窟正壁主佛像

南朝所流行者为道家言，质言之，即老庄哲学也。其张道陵、寇谦之之妖诬邪教，南方并不盛行。其与释道异同之争，亦多以名理相角，若崔浩焚坑之举，南人所必不肯出也。南方帝王，倾心信奉者固多，实则因并时聪俊，咸趋此途，乃风气包围帝王，并非帝王主持风气，不似北方之以帝王者之好恶为兴替也。尝观当时自由研究之风，有与他时代极差别者。宋文帝时，僧慧琳著《白黑论》、何承天著《达性论》，皆多曲解佛法之处，宗炳与颜延之驳之。四人彼此往复各四五书，而文帝亦乐观之，每得一札，辄与何尚之评鹭之。梁武帝时范缜著《神灭论》，帝不谓然也，自为短简难之，亦使臣下普答。答者六十二人，赞成缜说者亦四焉。在东晋时，“沙门应否敬礼王者”成一大问题。庾冰、桓玄先后以执政之威，持之甚力。慧远不为之屈，著论抗争，举朝和之。冰、玄卒从众议（以上皆杂采正史各本传，《高僧传》及两《弘明集》，原文不具引）。诸类此者，不可枚举。学术上一问题出，而朝野上下，相率为公开讨论，兴会淋漓以赴之。似此者，求诸史乘，殆不多觐也。若北方则惟见寺塔、僧尼之日日加增而已。其士大夫讨论教理之文，绝无传者；即僧徒名著，亦极希。后此各大宗派，不起于北而起于南，良有以也。然则南北两派，何派能代表我国民性耶？吾敢断言曰南也。五胡以后，我先民之优秀者，率皆南渡。北方则匈、羯、鲜、羌诸族杂糅，未能淳化于吾族，其所演之事实，非根于我国民性也。

北方之迷信的佛教，其发达之速实可惊。《释老志》尝列有简单之三度统计，今录如下：

年代	寺数	僧尼数
承明元年（公元 476 年）	6478	77350